Nohara Masaki and Ikeda Takumi (eds.) 2024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6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hange. Kyoto University. 225–242.

内陆闽语非南朝吴语直系后代说*

沈　瑞清　　**盛　益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　　复旦大学

Inland Min is not derived from Wu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Shen Ruiqing　　**Sheng Yim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udan University*

Summary

The hypothesis that "modern Wu, Min dialects are both derived from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r Jiangdong Fangyan" has received wide acceptance since it was proposed by Norman (1983) and Ding (1988). However, the hypothesis is largely based on evidences of shared retention rather than shared innovation. While the previous evidence can demonstrate that modern Wu, Min dial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to portray the exact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In this paper, we reexamined the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some linguistic innovations attested in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namely the lexical replacement in the pronoun system involving 'he/she', 'Plural for Personal Pronoun', 'That', 'How (heavy)', and 'What'. It is found that while the innovative pronoun forms are attested in modern Wu dialect as well as in the Coastal subgroup of Min dialect (Coastal Min), they are totally absent in the Inland subgroup of Min dialect (Inland Min). Furthermore, the unique forms attested in Inland Min can be traced to a very early stage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later influence from its linguistic neighbor, namely Gan dialect.

Based on the new evidence, we propose a new model on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modern Wu, Min dialects and Wu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While modern Wu and Coastal Min are derived from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land Min is rather a sister branch of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has diverged at an earlier stage. Also, the new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migration patterns in Fujian: 1)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of Fujian have developed separately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2) The inland area of Fujian has developed much earlier than the coastal area (see Bielenstein 1959, Wu 2009 among others).

Key words: Wu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u dialect, Coastal Min, Inland Min, Pronoun, Subgrouping

关键词：南朝吴语　吴语　沿海闽语　内陆闽语　代词　语言分群

*本文初稿曾于2022年9月在日本京都大学举行的第55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上报告，得到了与会学者，尤其是远藤光晓教授、罗仁地教授的诸多指教。本文也受益于秋谷裕幸教授、陶寰教授、曾南逸教授等的个人交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1. 问题的提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杰瑞（Norman 1983）、丁邦新（1988）就从不同角度提出“南朝吴语/江东方言[1]是现在闽语前身”的假说。随着对吴闽语调查的深入，很多学者（潘悟云1995、郑张尚芳2002）赞同这个假说，并认为南部吴语也是南朝吴语的后代。梅祖麟（2001）、郑伟（2015）、陶寰（2018）、陶寰、盛益民（2023）进一步指出北部吴语也跟闽语共享了很多词汇与音韵特征。因此，学术界大都认为现代的吴闽语是南朝吴语的后代[2]。以上假说，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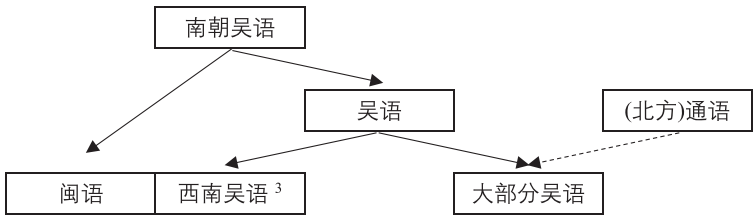

图1 “吴闽语来自南朝吴语”假说

学术界用来论证这一假说主要是根据词汇证据，尤其是郭璞（公元276–324年）注解古书时所引用的江东方言词汇，举例如下：

[1] 何大安（1999）指出，“江东方言”主要指东晋初相当于秦会稽郡一带的方言，代表城市是“吴”（今苏州）。学术界用的“南朝吴语”一般是泛指宋齐梁陈南朝时期（公元420–589）通行于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不过，南朝吴语里有很多层次（何大安1993），随着北方侨民跟南方土族的融合（李伯重2005），也会有所改变。所以，本文使用的狭义的“南朝吴语”，即“江东方言”的同义词，指东晋初今苏州一带的方言。

[2]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鲁国尧（2003）。

[3] 本文的西南吴语主要指吴语婺州片与处衢片，根据秋谷裕幸（2014），两者有密切的谱系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内陆吴语”（陶寰、盛益民2023）。

表1 保存在吴闽语中的郭璞江东方言词举例[4]

	Gloss	ladle	to hatch (eggs)	sleeve	duckweed	young hen	leech
		欚	菹	裷	薸	健	虮
	郭璞注	今江东通呼勺为欚	江东呼菹央富反	江东呼裷音婉	江东谓之薸音瓢	江东呼鸡少者曰健音练也	今江东呼水中蛭虫入人肉者为虮
内陆闽语[5]	石陂	kʰye1	ʔiu5	ʔyiŋ3	pʰiau5	X.sueiŋ6	kʰi5
	高唐	—	—	—	pʰiau7	X.ʃuãi5	kʰi7
沿海闽语	福州	—	—	uoŋ3	pʰiu2	—	kʰi2
	厦门	hia1	—	ŋ3$_{手\sim}$	pʰio2	nuã6	kʰi2
西南吴语	庆元	xai1	—	iəŋ3$_{手\sim}$	piɒ2	—	—
	玉山	—	əɯ5$_{蹲}$	tɕʰyẽ$_{\sim头}$[6]	biɐɯ2	—	kɐi3
北部吴语	绍兴	hᴇ1$_{\sim兜:一种捞鱼虾的网兜}$	—	—	biɒ2$_{浮\sim:浮萍}$	liẽ6$_{大\sim头鸡}$	—

我们认为，这些词汇证据只能说明现在的吴闽语跟南朝吴语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能证明吴闽语全都是南朝吴语的后代。下图是假设可能的谱系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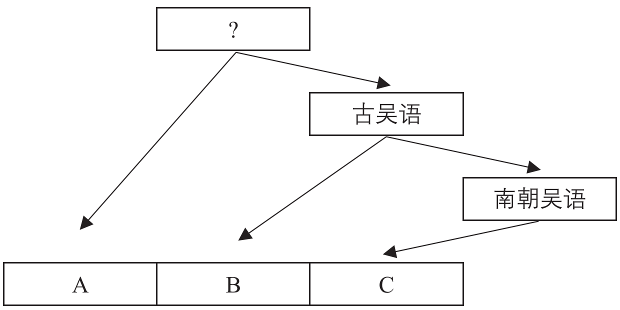

图2 南朝吴语与现代吴闽语各种可能的谱系关系

若此，则现在的吴闽语有可能属于C（南朝吴语的直系后代），也可能属于B（南朝吴语前身古吴语的后代），甚至有可能是A（跟古吴语只是旁系关系）。那么具

[4] 方言材料出处见文末，下同。

[5] 本文根据罗杰瑞（Norman 1991）的看法把闽语分成内陆闽语、沿海闽语两类，内陆闽语包括闽北方言、闽中方言与邵将方言。

[6] tɕʰyẽ是“手裷”的合音。

体如何判断现在的吴闽语究竟属于A、B、C哪种情况呢？

历史语言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同创新。正如Brugmann（1967[1886]: 24）所指出的：“有且只有不同语支之间的特有对应，即在某个时间某些语支在发展中经历的创新，才能够告诉我们它们之间的关系”[7]。因此，要判断现在的吴闽语是否都是南朝吴语的直系后代，必须首先找到南朝吴语的创新，然后看现在的吴闽语是否共享了这些创新。

南朝吴语在音韵、词汇、语法上都有创新，最明显也最少争议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代词系统上，尤其是下表的五个代词：

表2 南朝吴语的代词创新[8]

	He/she	Plural for P. Pronoun	That	How (heavy)	What
北朝口语	其/伊	等/辈	若=那	几	何
南朝吴语	**其=渠**	**侬?**	**许**	**若**	**等>底**

本文第2节着重考察以上五个代词创新在吴闽语中的具体表现，第3节进一步对吴闽语关系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 南朝吴语的代词创新及其在吴闽语中的表现

2.1 第三人称代词He/she

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指出：在唐以前是“渠／其”和“伊”并存，而且“渠”和“伊”属于不同系统的成分，两者没有发生过替换关系；“其／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于口语的第三人称代词，而“伊”最初可能是一个北方方言词，在《世说新语》中，“伊”的性质和“其”不同，它是一个北方方言词，东晋以后实际上只流通于“南渡北人”社团中。真大成（2022: 38）也认为：“伊”作第三人称代词，在南北朝时期的北中国应该还很流行。

汉语方言中的“渠”可以按照语音形式的不圆唇与圆唇分成“渠1”与“渠2”（梅祖麟2013）。

吴语中一般用“渠”的不圆唇形式（渠1），沿海闽语则用“伊”。详见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的讨论。

[7] 原文为：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 among the individual language branches [...] are the specific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wo or more of them, the innovations, by which each time certain language branches have advance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branches in their development.（转引自Jacques & List 2019）。

[8] 本表参考了魏培泉（2004）、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盛益民（2019）、陈鑫颖、盛益民（待刊）等成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表只关注南朝吴语的创新成分，有些代词的用法也是南朝吴语的特点，比如第二人称“汝”，但由于是直接继承自古汉语，不具有创新意义，就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而内陆闽语一般用“渠”的圆唇形式（渠2），请看下表：

表3 内陆闽语的第三人称代词

	He/she
闽中方言	沙县ky、盖竹ky、永安gy
邵将方言	高唐ky、邵武hu、和平hu
闽北方言	石陂gy、镇前kio、迪口ky、莒口ky、连墩ɣy、崇安hou
原始内陆闽语[9]	*gy渠2

由此，我们认为，内陆闽语的“渠2”跟吴语的“渠1”、沿海闽语的“伊”都无直接关系。同时，内陆闽语的“渠2”也不是后来受赣语“渠1”的影响，而是跟客家话、粤语的“渠2”同源，应该有较早的来源。

2.2 人称代词复数标记Plural for Personal Pronoun

吴语多称为“三侬之地”。而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指出，事实上“三侬”的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推到唐代，而且不限于吴地，到宋代仍然如此，例如：

（1） 王老小儿吹笛看，我侬试舞尔侬看。（唐·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诗之七）

（2） 驰誉超先辈，居官下我侬。（唐·安锜《题贾岛墓》）

（3） 将化，命旁侍警遗训于介众曰：“已过中寿，难逃大期。我侬远游，尔曹好住。沟若画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尚如是，今之禅宜勉旃。”（《唐文拾遗》卷四十四崔致远《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

从以上用例来看，当时“三侬”的基本含义就是表示人称代词复数（尤其是例3中“我侬”与“尔曹”对举）。由于“侬”是南朝吴语的重要词汇，也许可以认为“三侬”的说法在南朝吴语中就已经存在了。

沿海闽语用“侬”表示人称代词复数，福鼎、古田、龙岩、雷州、海口、海口、三亚等地至今仍然使用“侬”作为复数后缀（盛益民2019）。根据罗杰瑞（Norman 1983）、李如龙（1999）、梅祖麟（2001）、潘悟云（2010）、施其生（2016）等的研究，厦门、泉州一带的复数形式就是来源于单数“我、汝、伊”与复数标

[9] 本文对原始内陆闽语形式的构拟原则是：如果见于闽中、邵将、闽北中的两支且地理上不连续，则可以构拟到原始内陆闽语。本文只是构拟初步的声韵母形式，暂不涉及声调。

记“侬”的合音；汕头、揭阳、海丰等不少闽南方言第一、第二人称已经完成了合音，而第三人称仍是未合音的“伊侬”，也是很好的佐证。

吴语的复数标记“侬”只在丹阳、玉山、衢江$_{坑口}$、庆元等少数地区还有所保留（盛益民2019）。绝大部分的方言中，“三侬”经历了复数单数化的过程，“侬”成了单数代词的后缀，并对整个吴语的代词系统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详细请参看盛益民（2019）的讨论。

至于内陆闽语，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完全见不到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侬”的踪影。请看下表：

表4 内陆闽语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

闽中方言	沙县“𣍐”tse、盖竹“𣍐”tsɛ、永安“𣍐”tse
邵将方言	高唐“多”tai、邵武“多”tai、和平“多”tai
闽北方言	石陂“人”neiŋ/“多人”tuai.neiŋ、镇前“人”neiŋ、迪口“人”neiŋ、莒口“伙人”xuo.noiŋ、连墩“伙人”xuo.noiŋ、崇安“伙”xo
原始内陆	*tɑi多

内陆闽语人称代词复数用“多”来表示，见于邵将闽语、少数闽北方言，很可能是继承自原始内陆闽语的用法。虽然这种用法也见于少数靠近福建的赣语，如：余干“多[tə]人”、弋阳“多”toi、南城“多”tɔ、建宁“多”tai（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但我们认为它们是受到了内陆闽语的影响才产生了这样的形式。语音形式上，内陆闽语属于较早的歌韵读-i尾的层次，而赣语除了建宁（弋阳的形式来源不明）外则是较晚的语音形式。至于闽中方言的“𣍐”[10]，则是伴随着{多}义词经历了“多”到“𣍐”的替换过程中，复数标记也一起发生替换的结果[11]。

2.3 远指代词That

梅祖麟（1999）、魏培泉（2004）等指出，南朝乐府中就出现用“许”单用表示远指代词“那”的用例，例如：

（4） 风吹多帘起，许时寒薄飞。（子夜歌）

（5） 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宋武帝丁督护歌）

[10] 本文为了方便用“𣍐”来表示闽语中读塞擦音或擦音声母的｛多｝义词，并不表示我们认为“𣍐”就是本字。

[11] 关于闽语中｛多｝义词的演变，容另文详细讨论。

（6）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团扇郎）

吴语、沿海闽语都有用“许”表示远指的例子。这方面，李如龙（1999）、潘悟云、陶寰（1999）、盛益民（2012）等已经有详细讨论，本文不再赘述。

至于内陆闽语则大不相同。以下是我们对原始闽北语近指与远指代词的构拟，同时以“菇”作为构拟的参照：

表5 闽北方言的“这”、“那”与“菇”

	This	That	菇
石陂	ɦiɔŋ7	ɦu7	ɦu2
镇前	hia3/hi5	hua3/hu5	hu5
迪口	iɔ6	ua6	u8
莒口	i7	u7	u3
连墩	i7	o7	
崇安	i7	u7	u3
五夫	ɦi7	ɦu7	ɦu3
松溪	ie7	ua7	hu8
峡阳	tsi7	xu7	u9
观前	tsia7/tsie7/tsi7	ua7/uo7/u7	u3
临江	dʑie4/7	ho4/7	u6
黄坑	tɕi2	u2	u3
原始闽北	*tʃi7	*ɦu7	*ɦu1

表中标为绿色的形式直接对应原始闽北，其他颜色则经过类化、合音等变化而来。蓝色是*tʃi7受*ɦu7声母类化的结果，黄色是与量词“只”合音的结果，紫色则是与“样”合音的结果。相关的证明容专文讨论。

原始内陆闽语的形式跟原始闽北语相同，请看下表：

表6 内陆闽语的“这”与“那”

		This	That
原始闽北		*tʃi7	*ɦu7
闽中	沙县	tsia3	ua3
	盖竹	tʃa3	ŋua3
	永安	tʃiɔ6	uɔ5
邵将	高唐	tʃa3	va3
	邵武	tɕiɔŋ7	ɔŋ7
	和平	tɕioŋ7	u7
原始内陆		*tʃi	*ɦu

标为绿色的形式直接对应原始形式*tʃi、*ɦu，其他颜色则经过合音变化，黄色是与“只”的合音，紫色则是与“样”合音的结果。

当然，*ɦu7在原始闽北语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节，由于浊音7调一般并入3调，所以本来是一个空缺音位。虽然这个语素的来源不明，但目前看来跟”许”大概没有关系。

2.4 事物疑问代词What

梅祖麟、杨秀芳（1995）指出，疑问代词“底”[12]主要用于六朝乐府，现在的分布也偏南，应当是古江南方言的痕迹。例如：

（7） 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子夜秋歌）

（8） 腹中如灌肠，肝肠寸寸断，教侬底聊赖？（华山畿）

（9） 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侬绪？（读曲歌）

吕叔湘（1985）就已经指出，常州一代的吴语中存在疑问代词“底”；黄河（2021）论证了西北部吴语的“点个”“嗲个”是同一个疑问代词，来源为“底”，读的是齐韵的白读。当然，多数吴语早期用“何”询问事物（盛益民：待刊），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早期闽南语What的疑问代词是“是物”（Lien 2009），不过很多学者认为沿海闽语中出现在which、who、where等的疑问语素*tie4来源是“底”，暂时存疑待考。

[12] 至于疑问代词“底”的来源，学界多有争议，本文赞同其来源于“等”的说法。

而在内陆闽语中，则看不到“底”的踪迹。我们先来构拟原始闽北语的形式，请看下表：[13]

表7 闽北方言的“什么”与“谁”

	What	Who
石陂	su6.(mu6).k^{h}ai5/ su6.(mu6).ti6	su6.(mu6)
镇前	heiŋ5.ni6	heiŋ5
迪口	hi7.ni7.(ti7)	heiŋ7
莒口	su7.mu7/su7.xai3	su7.(mu7)
外墩	ɕi7.mo7	
连墩	so7.mo7	so7
松溪	soŋ5.moŋ5	soŋ5.moŋ5
峡阳	xiŋ4.mue9	xɛiŋ4
临江	su7.mu7	ɕi3
黄坑	ɕi1.mɛ1.k^{h}ɛu2	ɕi1.mɛ1
原始闽北	*ʃi.mu	*ʃi

正如秋谷裕幸（2008: 350）已经指出的，闽北语的形式看似非常多样，其实都可以用原始闽北语*ʃi.mu[14]这类形式来解释。表中黄色的直接来自原始形式，蓝色的形式来自*su.mu，是受到后一音节韵母的同化，紫色的形式很可能来自第一音节的弱化，绿色的形式则可能来自[mu]跟[xai]的合音。

构拟了原始闽北语的形式，我们再来看其他内陆闽语：

[13] 闽北方言的“谁”的形式往往与“什么”的第一个音节相关，因此一并列出

[14] 原文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写作[ɕ]，根据秋谷裕幸（手稿1）的构拟改成[ʃ]。声调比较复杂，暂时无法构拟。

表8 内陆闽语的“什么”、“谁”与“事情”

		What	Who	Affair
原始闽北		*ʃi.mu	*ʃi	*ti6
闽中	沙县	sɔ̃3.xa3, sɔ̃3.xɔĩ3	sɔ̃3	
	盖竹	sã1.ha3	sã1	ha3
	永安	ʃiɔ3.hɔ3	ʃi2	ʃa5
	王台	ʃi2.ti5	ʃi2	ti5
邵将	高唐	ʃi3/2.ti3	i1	sï6
	邵武	ɕia7	noŋ2.ɕi6.kəi5, ɕia7	sə6
	和平	ɕi4.maŋ2	noŋ2.ɕi6.kei5	se6
	洪墩	ɕi6.ti6		
原始内陆		*ʃi.ti	*ʃi	*ti6, *ʃə6

从表中可以看到，原始闽北的形式*ʃi.mu不见于闽中、邵武。因此，该形式可能是后来借入的。闽中大部分点、邵武的形式与“啥”比较接近，可能来自赣语的影响。而*ʃi.ti见于闽中的王台与邵将的高唐、洪墩，最有可能是早期形式的保留，*ti的来源可能是“事”，在闽北表示“事情”，有时也兼表“东西”[15]。内陆闽语的疑问代词非常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些形式都应该跟“底”没有关系，除了“啥”也跟赣语无关。

2.5 程度疑问代词How（heavy）

秋谷裕幸、汪维辉（2016: 117–118）总结了学界发现中古汉语“若”问程度的例证7条，补充发现1例，另有2个待定的例证，并且发现几乎所有的例证都来自于南方文献，所以认为：“‘若’应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方言，也就是梅祖麟先生所说的‘南朝通语’。”例如：

（10）未至家少许，见一人着黄皮袴褶，乘马将猎。少明问曰：“逸民家若远？”（晋裴启《裴子语林》）

（11）石城定若远，前谿应几深？（梁庾肩吾《咏舞曲应令》）

至于程度疑问代词“若”的来源，学界有不小争议，本文赞同松江崇（2018）、陈鑫颖、盛益民（2023）的观点，其由“若”询问方式的用法扩展而来，类似于英语的how。

[15] 关于闽语的｛东西｝义词，参看秋谷裕幸、沈瑞清（待刊）。

少数吴语（如绍兴柯桥话、上虞话）可以用“若”类疑问代词询问程度。而在沿海闽语中，普遍可见用“若”问程度的用法。盛益民、黄瑞玲（2023）认为沿海闽语各地的程度疑问代词经历了一个循环演化圈，各方言所处的不同阶段请见下表：

表9 沿海闽语数量-程度疑问代词的循环演化圈

阶段1	阶段2	阶段3
闽东片 问程度：若 问数量：若夥	莆仙片 问程度：若夥 问数量：若夥	闽南片厦漳泉台地区 问程度：〈若夥〉 问数量：〈若夥〉�half
闽南片潮汕地区 问程度：若 问数量：若稀		雷州、琼文片 问程度：〈若夥〉 问数量：〈若夥〉稀

而内陆闽语则是问数量与程度不分，都用“几多”来提问，例如：

表10 内陆闽语的数量-程度疑问代词

		How many	How（heavy）
闽中	沙县	ki.tua	
	盖竹	ki.ta[16]	
	王台	ki.tua	ki.tua
邵将	高唐	ki.tai	ki.tai
	邵武	ki.tai	ki.tai
	和平	ki.kei	
闽北	石陂	ki.tuai	ki.tuai
	镇前	ki.tua	ki.tua
	迪口	ki.tua	ki.tua
	莒口	ki.tue	
	连墩	ki.tue	ki.tue
	崇安	ki.mei7	ki.mei7
原始内陆		几多*ki.tɑi	几多*ki.tɑi

表中构拟的原始内陆闽语的形式在闽北、闽中、邵将方言中都有反映。

在赣语、客家话、粤语等南方方言中，一般都是用“几”来询问程度，用

[16] 盖竹的ta跟其他方言的形式韵母不对应，可能是经历了弱化演变。

“几多”问程度相对比较少见，大概是内陆闽语自己的创新。可能在更早的阶段，是用“几”问程度，之后发生了“几多”的词汇化，用“几多”来询问数量；再之后，“几多”又从问数量扩展出问程度的用法。

跟“人称代词复数”的“多”一样， 这里的“多”也是上古带-i尾的形式，是最早{多}义语素的残留，而不可能是来源于赣语影响的结果。处衢吴语也用*kəi1.təi1几多[17]，且多的语音形式也带-i尾。因此“几多”虽然在文献中晚出，很可能在方言中很早就有了。

“若”在内陆闽语中只出现在疑问代词“哪”中，而且韵母形式比沿海闽语表示程度疑问代词的“若”要晚了一个层次（秋谷裕幸、汪维辉2016）。如果说沿海闽语的“若”来自南朝吴语，那么内陆闽语的“若”则来自更晚的层次。

3. 再论吴闽语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第2节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下表：

表11 南朝吴语代词创新在现代吴闽语中的反映

	He/she	Plural for P. Pronoun	That	How（heavy）	What
南朝吴语	其＝渠	侬?	许	若	等＞底
现代吴语	渠$_1$	侬	许	若/几许	底/何/啥
沿海闽语	伊	侬	许	若	（是）物
内陆闽语	渠$_2$*gy	多*tɑi	*ɦu	几多*ki.tɑi	*ʃi

从表中可以看到，现代吴语继承了南朝吴语的所有五个代词创新，沿海闽语至少继承了三个。内陆闽语则没有共享南朝吴语的任何代词创新，而且这些原始形式都具有时间深度，不是后来受到赣语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内陆闽语不是南朝吴语的直系后代。

这个结论也跟移民史的证据相符。毕汉思（Bielenstein 1959）发现福建的内陆跟沿海地区在唐代以前是独立发展的，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如：葛剑雄1995、吴修安2009、林昌丈2019等）。柯蔚南（Coblin 2018）根据这一观点画出了下面的移民路线图：

[17] 庆元kai^{33}ʔdai^{334}（曹志耘等2000），构拟形式根据秋谷裕幸（2003）。

Map: Early Migration into Fújiàn after Bielenstein (1959)

Yellow: Migrations from southwestern Zhèjiāng into Mǐnběi (191- 205 A.D.)
Orange: Migrations from eastern Jiāngxī into Far Western Fújiàn (ca. 260 A.D.)
Purple: Coastal Migrations from the Wēnzhou area to Mǐndōng (post-280 A.D.)

图3 早期进入福建移民的路线图（Bielenstein 1959, Coblin 2018）

图中列出的是唐代以前进入福建的最重要的三波移民，其中黄色箭头代表从浙南进入闽北的移民（公元191–205年），橙色代表江西进入闽西北的移民（大约公元260年），紫色代表从温州地区进入闽东的移民（公元280年以后）。由此可见，福建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分别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从时间上来说，福建内陆地区的移民定居大约发生在汉末与三国时期，早于沿海地区，也早于南朝。因此，南朝吴语跟原始内陆闽语是同时期的两种不同的方言。至于福建沿海地区的移民定居，确切时间还有争议。我们认为，最大规模的一波，很可能跟浙东的沿海居民南下有关，刘淑芬（1987）指出：

> 梁朝末年，部分浙东沿海居民移往隔建和广东，是大业五年浙东籍户口数较刘宋锐减的原因。早在东晋时，就有浙东人民迁居广东，但这仅是少数避役百姓。浙东人民真正大批移民福建、广东，始于梁末。……隋代福建户数比刘宋时显著地增加。而这些避难移住福建、广东的人，多沿海道，这也可以解释此时濒海的会稽、临海二郡著籍户口的锐减。

因此，这些浙东移民带来的南朝吴语在闽东地区慢慢就形成了原始沿海闽语。

那么，如果说内陆闽语不是南朝吴语的直系后代，又如何理解罗杰瑞先生（Norman 1973, 1974, 1981）所构拟的原始闽语（Proto Min）呢？

柯蔚南（Coblin 2018）根据罗杰瑞先生晚年的想法认为原始闽语是几支来源不同的方言群互相融合的产物，罗仁地（Lapolla 2023）也从移民史的角度支持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不同闽语分支在进入福建之后的接触融合与这些闽语分支早期是否同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承认不同闽语分支在福建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更早的时期不是来自同一个祖语。移民史的材料只是说明原始闽语不太可能在福建产生，但并不排除今天的闽语分支曾经来自一个福建之外的共同祖语。从内陆闽语与沿海闽语在音韵跟词汇上具有相当多的一致性来看，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祖语。同时，考虑到沿海闽语跟南朝吴语/现代吴方言的密切关系，这个祖语应该也是现代吴语的祖先，可以称作“原始（吴）闽语（Proto (Wu) Min）”。“原始（吴）闽语（Proto (Wu) Min）”与现代吴闽语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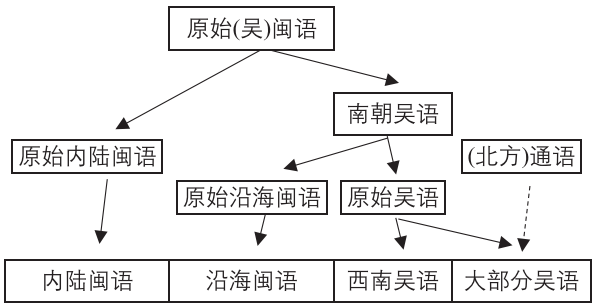

图4 吴闽语关系与原始（吴）闽语

如图所示，我们提出以下的设想：现代吴闽语的共同祖先“原始（吴）闽语（Proto (Wu) Min）”诞生在福建以外的地区。后来，其中的一支则经过浙南/江西进入福建内陆地区，成为内陆闽语的祖先，另一支则进入太湖地区，成为南朝吴语。再后来，南朝吴语的一支从浙东进入福建沿海地区，成为沿海闽语的祖先。而留在吴地的南朝吴语后来受到大量来自北方通语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吴语已经很少保留早期的特征，南朝吴语的特征主要保留在西南吴语中。虽然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都保留了很多“原始（吴）闽语”的特征，不过，在谱系关系上，沿海闽语跟原始吴语反而更接近[18]。

当然，本文的考察范围只限于南朝吴语的五个代词创新。因此，最后的结论还是非常初步的，以后还要进一步通过音韵、词汇、语法等更多特征的考察，加以检验与修正。

[18] 从词汇的角度来看，与吴语关系密切的也是沿海闽语而非内陆闽语（陶寰、盛益民2023）。另外，客家话与闽语也可能有密切的谱系关系，本文暂时不涉及这个问题。

方言材料出处（下划线为文中使用的简称）

闽北方言：浦城石陂、政和镇前、建瓯迪口（秋谷裕幸2008）、建阳莒口（Norman 1969）、建阳连墩（Norman 2002）、崇安（Norman m.s.2）、松溪（秋谷裕幸1993）、浦城观前（秋谷裕幸2021）、延平峡阳、莒口外墩、崇安五夫（秋谷裕幸（手稿1））、浦城临江（秋谷裕幸（手稿2））、建阳黄坑（笔者调查）

闽中方言：沙县（李如龙2001）、沙县盖竹（邓享璋1996、1997）、永安（周长楫、林宝卿1992）、延平王台（黄淑敏2015）

邵将方言：将乐高唐（Norman m.s.1）、邵武（Ngai 2021）、邵武和平（Norman 1995）、邵武洪墩（杜晓萍2020）

沿海闽语：福州、厦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1995）、福州（陈泽平1998）、遂溪（Yue-Hashimoto 1985）

吴语：庆元、玉山、龙泉（曹志耘等2000）、广丰（秋谷裕幸2001）、绍兴（王福堂2008）

赣语：余干、弋阳、南城、建宁（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

参考文献

［英文］

Bielenstein, H.

1959 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he T'ang. In: *Studio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Brugmann, K.

1967 [1886] *Einleitung und Lautlehre.* Berlin, Leipzig: Walter de Gruyter.

Coblin, W. S.

2018 Convergence as a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oversial common min phonological configuration. *Yuyan yanjiu jikan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21: 79–122.

Jacques, G., & List, J. M.

2019 Save the trees: Why we need tree models in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d when we should apply them). *Journal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9(1): 128–167.

Lapolla, R. J.

2023 How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Influe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Language History: The Case of Min Chinese. *Inspirations from a Lofty Mountain—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90th Birthday*, 81.

Lien, C. F.

2009 The Focus Marker Si7 是 and Lexicalization of Si7 Mih8 是乜 into What Wh-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4): 745–764.

Ngai, S. S.

2021 *A Grammar of Shaowu*. De Gruyter Mouton.

Norman, J.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38.
1974 The Shaowu dialect. *Orbis: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Linguistique* 23(2): 328–334.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ugust 15–17, 1980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pp. 35–73).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 yan* 3: 207–208.
1991 The Mĭ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illiam S.-Y. Wang (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325–358.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A glossary of the Herpyng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I*: 107–126.（根据英文词汇改编成的同音字汇见：沈瑞清（2012）．闽北邵武和平方言同音字汇．《东方语言学（第11辑）》）
2002 A glossary of the Lianduentsuen dialect. *Short Chinese Dialect Reports* 1: 339–394.
m.s.1 The Gaotang Dialect.
m.s.2 The Chongan Dialct.
Yue-Hashimoto, A. 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语文出版社．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12).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鑫颖、盛益民
2023 汉语程度特指问的编码策略的类型学研究——兼论程度疑问代词的演变模型．《中国语文》(3): 279–190.
待刊 汉语程度疑问代词的共时类型与历时演变．
邓享璋
1996 沙县盖竹话常用词汇（上）．《三明学院学报》(S2): 22–33.
1997 沙县盖竹话常用词汇（下）．《三明学院学报》(S2): 19–31.
杜晓萍
2020 福建邵武洪墩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 110–124.
丁邦新
1988 吴语中的闽语成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本1分．
葛剑雄
1995 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 165–171.
何大安
1993 六朝吴语的层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本4分．
1999 论郭璞江东语的名义．In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49–56.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黄河
2021 西北部吴语事物疑问代词的来源.《方言》(2): 173–178.
黄淑敏
2015 《福建省南平市王台方言词汇研究》. 云南大学硕士论文.
李伯重
2005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6): 91–107.
李如龙
1999 闽南方言的代词，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263–288页，广州.
2001 《福建县市方言志 12 种》.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林昌丈
2019 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以墓砖铭文为中心.《文史哲》(2): 130–142.
刘淑芬
1987 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 485–524.
鲁国尧
2003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 学林出版社.
梅祖麟
1999 几个台湾闽南话常用虚词的来源.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41.
2001 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1): 3–15.
2013 汉语方言里的三个指代词：「汝」、「渠$_{他}$（佢）」、「许$_{那}$」—再论鱼．虞有别与现代方言，郑秋豫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资讯和语言类型》.
梅祖麟、杨秀芳
1995 几个闽语语法成分的时间层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1: 1–21.
潘悟云
1995 温，处方言和闽语.《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汉语复数词尾考源，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潘悟云、陶寰
1999 吴语的指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25–67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秋谷裕幸
1993 闽北语松溪方言同音字表,《开篇》（东京：好文出版）vol. 11，51–67页.
2001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総合政策学科.
2003 《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构拟》，日本东京好文出版.
2008 《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 台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
2014 吴语各片之间的谱系关系.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4)*
http://iscll-14.ling.sinica.edu.tw/files-pdf/Papers/Session1/Akitani.pdf
2021 福建浦城观前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100–117页.
手稿1 《闽北区三方言历史音韵研究》.
手稿2 临江方言同音字表.
秋谷裕幸、沈瑞清
待刊 闽语的｛东西｝义词.

秋谷裕幸、汪维辉
2016 闽语中疑问代词用法的“若”,《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辑，111–122.
盛益民
2012 论指示词“许”及其来源，《语言科学》(3): 276–286.
2019 复数单数化与汉语方言单数代词中后缀［侬］的来源——一项语义创新及其对东南方言代词系统的影响．*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1): 29–51.
待刊 从方言接触看疑问代词“啥”从官话到吴语的扩散．*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盛益民、黄瑞玲
2023 疑问代词的循环演化圈：基于闽语的考察．京都大学中国语学研究会第2回workshop“闽语史的新视野”（2023年08月12日）.
施其生
2016 闽南方言的三身代词，收录于丁邦新、张洪年、邓思颖、钱志安主编《汉语研究的新貌：方言、语法与文献》，181–19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松江崇
2018 抉择义疑问代词“哪”的来源及其功能扩展机制，韩国中文学会国际学术论坛“中国古文献和语言研究的新潮流”，2018年6月22日.
陶寰
2018 吴闽语云，匣母的读音和闽语全浊声母的清化.《中国语文》(3): 335–350.
陶寰、盛益民
2023 吴闽语共同特有词汇说略,《汉语史学报》28: 1–25.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维辉、秋谷裕幸
2017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现状和历史,《汉语史学报》17: 14–59.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福堂
2008 绍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 1–17.
魏培泉
2004 《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台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
吴修安
2009 《福建早期发展之研究：沿海与内陆的地域差异》．稻香出版社.
真大成
2022 基于微观史的六世纪上半叶河北“汉儿”口语考察——以侯景会话为中心.《汉字汉语研究》18(2): 28–44.
周长楫、林宝卿
1992 《永安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
郑伟
2015 从比较音韵论北部吴语与闽语的历史联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9–149.
郑张尚芳
2002 闽语与浙南吴语的深层联系，收录于丁邦新、张双庆主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7–26页.